

霸权稳定论与 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钟飞腾

【内容提要】 作者探讨了霸权稳定论如何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20世纪70年代,学者对不同国际经济问题领域的研究催生了霸权稳定论,其核心主张是国家间权力的霸权式分布有利于国际经济秩序稳定。80年代以后,年轻学者从两个方面拓展了霸权稳定论的研究:第一,霸权稳定论的逆否命题——霸权衰落导致霸权国干预国际经济政策的力度加强——成为80年代富有影响力的理论假设和政策辩论主题。第二,从核心概念、理论基础、历史类比和地区扩展等四个层面深化霸权稳定论的学理内涵。到90年代初,学者们认为权力分布和自由体系之间呈现出一种U关系,即国家间权力的差距过大或者过小时国际经济体系都呈现出开放状态。欧美学者围绕霸权稳定论长达20多年的争鸣,以霸权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和国际体系的开放还是保护为分析对象,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从体系层面向国内层面的转型。霸权稳定论的发展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而言,至少在区分问题领域、多学科发展以及学术分工这三点上需引起重视。

【关键词】 霸权稳定论;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外经济政策;学术史

【作者简介】 钟飞腾,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邮编:100007)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 - 9550 (2010) 04 - 0109 - 14

^{*} 本文为提交给2009年7月11~12日在清华大学举办的第二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会议”论文,作者感谢会议举办方的邀请,同时对IPE专场主持人田野的评论表示感谢。本文的一些观点形成于同王正毅教授的探讨,曲博、杨毅在本文写作中提出不少意见。另外,《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两位匿名评审人认真审读本稿并给出了十分重要的意见。笔者对以上诸位学者的批评和帮助表示感谢,当然文中存在的错误和纰漏由笔者承担。

一 导言

回顾国际政治经济学 (IPE) 的发展历程,霸权稳定论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是推动其发展的重要理论之一,这一理论认为霸权国和国际开放经济秩序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中国学术界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开始就对什么是霸权稳定论及其代表人物、主要观点和影响做了介绍、分析和评论,并且广泛探讨了霸权与国际体系的关系。这些学者的工作为我们理解霸权稳定论的产生和影响起了重要的作用。围绕一个自由、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是否需要一个霸权国家的领导以及单一霸权国的存在是否一定造就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等问题,西方学术界形成了持续时间相对较长的争辩和经验验证。围绕霸权稳定论展开的论战不仅是理解 20 世纪 70~80 年代国际问题研究的一种线索,也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术史发展的早期主线。

近些年来,中国学术界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化不仅促进了我们对在中国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的认识,也意识到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曾明显出现过两代学者的阶段性变迁,第一代学者集中在体系层次,第二代学者的研究则纳入了国内政治因素。与此同时,一些学者提及在欧美国际政治研究和教学领域的发展过程中,“美国的衰落”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一个强有力的背景。不仅如此,有学者认为 20 世纪 80 年代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论战源于并依附于霸权稳定论提出的经验议题。那么作为贯穿整个 70~80 年代的富有影响力的学术命题,霸权稳定论到底如何促进并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并实现了从体系到国内的

任东来:《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霸权稳定理论》,载《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6期,第15-22页;樊勇明:《霸权稳定论的理论 & 政策》,载《现代国际关系》,2000年第9期,第20-23页;周丕启:《霸权稳定论:批判与修正》,载《太平洋学报》,2005年第1期,第13-23页。

严格说来,对于霸权与国际政治秩序的关系并非霸权稳定论探讨的原意,尽管西方学者也讨论霸权问题和霸权稳定论,但是这之间存有区分。鉴于美国权势对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探讨美国权力以及历史上霸权的特征也成为中国学者研究的一个主题。参见王在邦:《霸权稳定论的批判——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历史考察》,北京:时事出版社 1994 年版;刘靖华:《霸权的兴衰》,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7 年版以及《中国书评》杂志 1998 年 8 月号关于该书的主题书评;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斗争中的支持行为 (1945~198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王缉思:《美国霸权的逻辑》,载《美国研究》,2003 年第 3 期,第 7-29 页;门洪华:《西方三大霸权的战略比较——兼论美国制度霸权的基本特征》,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 年第 2 期,第 60-66 页。

王正毅:《超越“吉尔平式”的国际政治经济学——1990 年代以来 IPE 及其在中国的发展》,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 年第 2 期,第 22-39 页。

查道炯:《国际政治经济学与中外关系研究:背景意识问题》,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 年第 2 期,第 41 页。

吉宓:《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基础与研究纲领的拓展》,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 年第 2 期,第 68 页。

研究转变呢？

本文主要从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的角度重新分析、评论霸权稳定论在研究方法上的启发,试图回答一个问题: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术共同体如何围绕霸权稳定论的学术命题进行证明或者证伪?以下本文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如何从政治逻辑出发,从不同问题领域各自得出作为学术命题的霸权稳定论;第二部分,如何准确地理解作为一个学术命题的霸权稳定论;第三部分,20世纪80年代的学者在证明或者证伪霸权稳定论时做了四个方面的扩展;第四部分是结论以及围绕霸权稳定论所展开的学术争鸣的启示。

二 政治逻辑与霸权稳定论的起源

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美国是否衰落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激烈讨论。作为一个话题,美国是否衰落的争论本身提供了进行多学科研究的个案。社会关心的话题为社会科学研究和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20世纪经济学的重大进展以及国际关系本身的发展都与当时社会辩论的话题直接相关。但是要成为某一个学科的重大研究和争鸣对象,还需要一些条件。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而言,首先,霸权稳定问题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旨趣紧密联系,在一些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规律上有着探索的价值。其次,经过适当概括后可以纳入理论的推演,并且霸权稳定论的假设对理解国家行为特别是对外经济政策形成富有启发性的见解。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霸权稳定论之所以引起学者们长达30年的研究热情,并不简单是因为美国的实力到底衰落多少的问题,而是因为经过适当的改造形成了可供经验证明或者否定的学术命题,吸引了众多学者加入。霸权稳定论最富特色的地方在于把权力分布(自变量)和国际经济的开放程度(因变量)联系起来,给定了保护主义和开放主义这样一个可供选择的菜单。对什么而言霸权衰落是个问题,构成了学者们探讨的基础。最后,不可忽视的一点是,霸权稳定论最终在国际关系的路线下而非经济学的路线下成长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导范式,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此前国际关系学术界对地区一体化进程、公共物品等问题的探讨,这些理论性成果对于理解权力与经济的关系起了作用。对发展生成某一个主导范式而言,除了重大的现实问题之外还需要思想理论上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第165-176页。

的准备。

霸权稳定论的学术起源是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 (Charles Kindleberger) 1973年出版的《世界大萧条: 1929~1939》,在此书中金德尔伯格提出了一个自由的国际经济秩序需要政治领导力这样一个命题。作为经济学家、经济历史学家的金德尔伯格研究这个问题主要是为了提出一个不同于当时主流经济学理论对大萧条的理解。20世纪60年代,货币主义对大萧条缘起于美国货币政策的失误这一解释是压倒性的。金德尔伯格在形成新的解释时,引入了政治学中的“领导者 (leadership) 概念和公共物品原理,需要注意的是,金德尔伯格在书中并未使用“霸权 (hegemony)”一词。金德尔伯格认为,之所以发生大萧条是因为作为霸权国家的英国失去了继续领导国际经济的能力,而能力上能够担当起这个角色的美国则缺乏意愿。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没有大国肩负起维护自由贸易机制、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以及最后的清偿者等稳定器的角色,国际经济秩序的失序是不可避免的。研究国际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通过翔实的历史分析提出了政治因素如何影响经济运行的命题。《世界大萧条: 1929~1939》一书的出版恰逢其时。1971年,美国单边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同时对进口商品征收短期的10%关税。这一政策结束了塑造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政治经济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对学术界的影响十分深远,加速了对美国权力是否衰落的思考和争论。而霸权稳定论所要探讨的命题——一个霸权国的存在对于自由的国际经济秩序是必要的——也是美国国家战略的反映。一方面,二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塑造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大萧条经济政策的反思;另一方面,对于衰落的美国而言,是否还要继续维持一个自由的国际秩序成为中央决策者必须思考的核心问题。金德尔伯格这一研究选取的时段和事件、反映的主题和得出的结论充分显示了一位国际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家的学术能力和眼光,体现了思考重大国际经济金融事件时政治要素和经济要素之间的均衡是何等地重要。

金德尔伯格的观点很快在政治学家中引起共鸣。罗伯特·吉尔平 (Robert Gilpin) 1975年出版了《美国的实力和跨国公司》一书,哈佛大学年轻的政治学博士斯蒂芬·克拉斯纳 (Stephen Krasner) 1976年在《世界政治》杂志上发表了后来引领潮流的经典

笔者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评审人指出这一点。

Charles P.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 - 1939*, Hamondsworth,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1986 金德尔伯格在序言中表示他亲历了1929年的大萧条,从20世纪60年代末就开始准备该书的写作。

关于美国权力衰落的声音从艾森豪威尔政府时就已出现,但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来的政治经济发展确实表明,美国不复拥有二战刚结束时的超级地位,美国回到了正常位置。参考 Richard Rosecrance, ed., *America as an Ordinary Country: U. 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Futur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6.

文章《国家实力与国际贸易结构》。两位年轻的政治学者把金德尔伯格的思想改造成了一个更偏向于 IPE 的命题,从强调领导国出于仁慈目的提供公共物品,转入强调霸权国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自身的利益,是成本收益分析之后的国家利益决定国家的对外行为,这样从学理脉络上看就承接了国际关系的研究议题。不过,当时他们两位都没有明确把政治性的权力决定国际经济秩序的关联性概括成一句话,而这一点对于学术发展而言则至关重要。

1980年,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在一篇文章中用简短的语句直接把这种关联性或者因果机制命名为“霸权稳定论”。需要说明的是,基欧汉当时提出这个命题是把它当成批评的对象或进一步立论的反面,他是为了否定霸权的相对衰落不一定直接造成国际经济秩序失序,为研究国际制度理论做准备。另外,基欧汉对霸权理论的一项发展是区分总体性权力和具体问题领域的权力与国际机制的关联性,这一思想是对1977年《权力与相互依赖》中关于具体问题领域分析的具体化。基欧汉和约瑟夫·奈(Joseph S. Nye)认为,权力的总体式分布和国家是否支持某一个具体问题领域的国际机制并不一定相吻合。因为国家的权力和利益受到两个层次的制约,总体性的权力变动和具体问题领域权力的变动并不总是保持一致。这一点和霸权稳定论的提倡者其实并不矛盾,因为霸权稳定论中的权力是由诸多具体问题领域的力量构成,但是20世纪70年代,学者在构建这个命题的时候并未给予构成权力的各个变量一个权重。

可以说,正是基欧汉这篇文章的研究方法与争鸣姿态直接推动了后来者对霸权稳定论的证明或者证伪。同时在这一年,克拉斯纳主编的 IPE 丛书再版了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曾于1945年出版的《国家权力与对外贸易结构》。在此书中,赫希曼提出古典时代关于贸易所得和权力的概念事实上是同一事物的两面而已,国家间的依赖程度也就是权势的相对程度决定对外贸易的效应。《美国政治学评论》杂志事隔35年后又一次对这本书进行了推荐,评论人戴维·鲍德温(David A.

Robert Gilpin, *U. S. 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5; Stephen D. Krasner, "State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orld Politics*, Vol 28, No 3, 1976, pp. 317 - 347.

Robert Keohane, "The 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 and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gimes, 1967 - 1977," in Ole R. Holsti, Randolph M. Siverson, and Alexander George, eds., *Chang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0, pp. 131 - 162.

参考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7, chapters 3 and 6.

Albert O. Hirschman, *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Baldwin)说,“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以及国际政治的学者们不应该因为这本书的出版年代而被误导,这本书的分析与今天的关联就像它 20 世纪 40 年代的时候那样,甚至更为重要。这本书理应是每一位严肃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家的案头读物,现在再版是众望所归”。这些工作为后来十多年霸权稳定论的学术争鸣做了铺垫。

三 准确理解作为学术命题的霸权稳定论

我们回顾霸权稳定论的诞生时,有两个重要的特点需加以注意:第一,作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金德尔伯格其出发点和视角与作为政治学者的吉尔平和克拉斯纳有所不同。这一点我们在上文已经做了提醒,在这里仍然有必要再做强调。斯蒂芬·克拉斯纳认为,金德尔伯格强调的是公共物品视角,假定所有国家都能从自由国际经济中获益;他本人和吉尔平偏重于国家权力视角,国家会考虑霸权国通过开放经济对国内社会稳定施加的影响。对于当时如何转换金德尔伯格的思想,罗伯特·吉尔平 20 多年后做了三点说明:其一,从概念上用“霸权”一词替换“领导者”,意在表明领导者必须使用权力实现目标。其二,领导者创造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目的是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出于仁慈。其三,金德尔伯格假定领导者的利益主要在于经济层面,而政治学家则强调同时包含政治利益。20 世纪 80 年代学者对霸权稳定论的争论主要是在第一种视角下展开的。戴维·莱克(David Lake)在 90 年代则更进一步认为霸权稳定论不是一个单一的理论,而是一种研究纲领。他把霸权稳定论分为领导理论(leadership theory)与霸权理论(hegemony theory),前者主要立足于公共物品理论,后者则探索国际结构的开放模式。由于莱克本人当时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国际贸易政治,因此他在对霸权理论进行分析时,从研究国际贸易政治的理论中选择了三个理论:现实主义霸权理论、战略贸易理论和“第二意向颠倒”理论。这三个理论在莱克看来都可以归类到霸权理论中。

第二,霸权稳定论赖以立论的具体问题领域并不相同。金德尔伯格的立论基础是

David A. Baldwin, "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5, No 4, 1981, p. 1106.

Robert Gilpin, "The Rise of American Hegemony," in Patrick Karl O'Brien and Armand Clésse, eds., *Two Hegemonies: Britain 1845 - 1914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41 - 2001*, Burlington: Ashgate, 2002, pp. 166 - 167.

Michael C. Webb and Stephen D. Krasner,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5, No 2, 1989, pp. 183 - 198.

David A. Lake, "Leadership, Hegemony,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Naked Emperor or Tattered Monarch with Potential?"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7, No 3, 1993, pp. 459 - 489.

国际金融货币领域,吉尔平是国际直接投资领域,而克拉斯纳主要是国际贸易领域。从后来的发展来看,国际贸易领域的实证分析最多,货币领域次之,直接投资领域排第三,这一发展状况和整个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基本吻合。谈到具体问题领域,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个事实:首先,国际经济问题的实证分析需要一定数量的数据。就20世纪70年代这三个领域的的数据储备情况而言,贸易问题的数据相对来讲容易得到,而且各国普遍具有贸易交易,而在金融货币与投资领域美国独霸天下的局面是显而易见的,国际组织从70年代末才开始系统整理投资方面的数据,数据收集的滞后性延缓了这两个领域的进一步分析。其次,就经济学研究的发展程度而言,这三个问题领域的经济学背景也不相同。国际贸易经济学衔接重商主义的经济学,争鸣历史悠久,学者对基本的经济学理论存在共识。但是对直接投资而言,经济学的研究从20世纪50~60年代才慢慢起步,而且在整个直接投资理论研究中并不占主导地位。在货币金融政策方面,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从60年代末才进入政治学视野。美国60年代的时候并没有多少人注意国际货币事务,甚至政治家也不考虑国际货币政策,只是在一部分学者中得到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最后,从对外经济政策变动的频度和可使用的政策工具来看,贸易领域最为频繁和广泛。

除了以上学理视角、问题领域的异同之外,从学术命题的构成要素来看,我们还需注意三点:第一,逻辑关系中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区分,吉尔平一再强调霸权不是充分条件。20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指责霸权稳定论的一个失误是它混淆了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比如,曾有两位经济学家误认为霸权既是必要条件也是充分条件。这明显背离了吉尔平的原意。在吉尔平看来,霸权稳定论不是决定论,而是有条件性的。第二,能力和意愿的组合构成自变量。因此,从考虑意愿的程度来看,霸权稳定论的政治决定国际经济体系的特征是有相当的英美特色的,特别是融入了美国的意识形态考虑。克拉斯纳分析美国对外经济政策时强调,美国的传统和历史经验推动美国在二战后有相当的意愿承担起领导者这个责任。第三,经济决定的长期趋势和政治决定的

吉尔平的原文是“necessary(albeit not a sufficient)”,参见 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86. 2001年版新书原文是“a hegemon is a necessary but not a sufficient condition”,参见 Robert Gilpin,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Princeton and Lond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94.

Beth V. Yarbrough and Robert M. Yarbrough, “Cooperation in the Liber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fter Hegemony, Wha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1, No. 1, 1987, p. 16

金德尔伯格的原文有两个词“capability”和“willingness”。克拉斯纳的论点参考 Stephen D. Krasner, “United States Commercial and Monetary Policy: Unraveling the Paradox of External Strength and Internal Weakness,”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Between Power and Plenty: 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tates*,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8, pp. 51 - 87.

短期趋势。吉尔平在论述政治与经济在国际体系层面的互动关系时指出,从短期来看,权力分布与政治系统决定财富生产和分配的框架;而从长期来看,有效率的经济体系最终会变革政治系统,从而在某一个时点上国际经济体系的特征是由占据优势地位的国家决定的。离开了以上三点来理解霸权稳定论,只能说在谈论与霸权相关或者与国际经济体系相关的问题,而不是探讨霸权稳定论这个学术命题。任何理论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在做外延拓展和问题领域拓展时要特别小心,不同问题领域甚至不同时间段都不相同,这与流行的自由主义国际经济学理论是十分不同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始终强调领土国家的不可流动性与经济要素流动之间的矛盾关系。

四 经验验证与霸权稳定论的进展

如果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霸权稳定论止步于基欧汉 1980年提出的“霸权稳定论”这一概括,它不会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事实上,在克拉斯纳的论文《国家实力与国际贸易结构》发表 20年后,1997年基欧汉在《世界政治》杂志上撰文重新评述了克拉斯纳这篇文章对于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意义。基欧汉认为这是克拉斯纳第一次清晰地把经济学和政治学做了有效的融合,国家权力和国际经济结构的关系这一问题为后来的学者界定了研究议题。众所周知,基欧汉本人在批评霸权稳定论的过程中,通过对贸易、货币和石油等问题领域的研究,提出霸权衰退后维持一个相对自由的国际经济秩序并不是没有可能,并由此开始了制度主义的研究。即便是发展霸权后的思想,基欧汉的研究还是集中在体系层次,并未纳入国内政治。中国学术界对制度主义的研究相当熟悉,在此我们要关注另一种从霸权稳定论发展而来的研究视角。

第一代学者集中研究体系层次的权力关系和自由经济秩序,而 20世纪 80年代年轻学者的有很大一部分转向研究:在权力衰退的情况下,霸权国的对外经济政策

Robert Gilpin, *U. S. 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5, p. 43.

Robert O. Keohane, "Problematic Lucidity: Stephen Krasner's 'State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orld Politics*, Vol 50, No 1, 1997, pp. 150 - 170.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2005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再版了该书,基欧汉在新书序言中认为,由于美国成为前所未有的霸权国,实际上无法经验验证“霸权之后”制度是否持续。

基欧汉在 2005年版新书序言中声称,《霸权之后》的一个重大不足是未能把国内政治纳入分析视野。参见 Robert O. Keohane, "Preface to the 2005 Edition," in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p. xiii - xv.

是否从自由转向保护。这一转向,也即霸权稳定论的逆否命题——霸权衰落导致霸权国干预国际经济政策的力度加强——成为80年代富有影响力的理论假设和政策辩论主题。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二战后美国权力的象征和支柱,在国际层面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含义是一个自由的贸易体系以及美国为中心的货币体系,它的解体首先从美国国际货币政策的变革开始。1982年,政治学者约翰·奥德尔(John Odell)出版了《美国国际货币政策》一书,认为市场力量、权力结构和观念结合起来可以解释三个时段——60年代后期特别提款权创立、1971年和1973年汇率政策与储备政策——美国国际货币政策变化。奥德尔富有解释力的研究充分证明了美国国际货币政策从60年代被人忽视到最终成为尼克松、基辛格等政治家捍卫美国国家利益的工具这一过程中,美国力量的衰落和经济学者们的实证分析所起的作用。1982年,威廉·埃弗里(William Avery)和戴维·拉佩肯(David Rapkin)主编了《美国身处转变中的世界政治经济》一书,收录了克拉斯纳、基欧汉、蔡斯·邓恩(Chase - Dunn)、乔治·莫德斯基(George Modelski)等一流理论家以及一批研究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专家的文章,这是第一本结合体系层次的霸权稳定论和国内政策进程的分析理解霸权衰落中的美国对外经济政策转折的文集。该书强调霸权稳定这样的宏大理论需要结合具体的政策进程分析,才能在特定的情景和具体的事件中为美国提供可供选择的政策。1984年阿瑟·斯坦(Arthur Stein)通过对19世纪后半期英国和20世纪美国的比较研究认为,霸权国和自由国际经济秩序之间存在一种“霸权困境”:追求绝对的获益时,霸权国愿意维持一个导致缩短与竞争者差距的自由国际经济秩序;追求相对获益时,霸权国更倾向于执行重商主义政策,而这种政策诉求最终导致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衰退甚至崩溃。这样,学者们初步完成了从体系到国家层面的转移,从追求长线条、大时段的研究转入霸权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分析,这是霸权稳定论的一大转型。

除了总体性的政策转向之外,20世纪80年代学者在深化这一命题的研究时主要做了如下几项工作:第一,进一步测度霸权和自由国际经济秩序这两个变量。就霸权稳定论中政治和经济相关联的分析而言,金德尔伯格、吉尔平、克拉斯纳的工作对变量进行了比较严谨的定义和衡量。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比一般关心国际经济秩序的人

John S. Odell, *U. 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licy: Markets, Power, and Ideas as Sources of Chan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William P. Avery and David P. Rapkin, eds., *America in a Changing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and London: Longman, 1982.

Arthur A. Stein, "The Hegemon's Dilemma: Great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8, No 2, 1984, pp. 355 - 386.

们更重视概念化那些现象,并且给予数量上可以比较的程度差异。在衡量作为自变量的实力时,这三位学者用了经济力量的国际分布对比值,有以下六项指标: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资本收益、经济增长率、世界贸易份额、国际投资的份额和世界货币储备的份额。在衡量作为因变量的自由国际经济秩序时,主要用到了资本流量、贸易流量以及政策的管制程度等变量,但是至于各项指标的权重,这三位学者没有给出具体百分比。造成这种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构成这个命题的两个因素中,对于能力大家一般可以比较确认,尽管多数学者也未必对各个量的权重进行分析,而对意愿的观察与比较则相对较难。如何给予霸权稳定论中衡量国家实力的各个具体指标权重,是80年代学者论争的一个焦点。1984年,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中提到霸权国需要控制四个关键领域:原材料、资本来源、市场和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同时,基欧汉以世界贸易份额与相对劳动生产力对比了英国霸权和美国霸权的差异,认为英国霸权远没有达到美国的实力。莱克认为,从经济学角度理解,比较优势和相对获益的最终来源是劳动生产力,因此吉尔平、克拉斯纳等人强调可以把霸权国拥有效率和先进技术理解为劳动生产力高。有的学者则对霸权稳定论仅把力量限定在物质性尤其是经济因素提出质疑,认为理解霸权力量需要纳入军事、科技和其他因素。还有的学者走得更远,超出了霸权稳定论的讨论范畴,认为探讨美国霸权是否衰落需要考虑非物质性因素。在衡量因变量自由国际经济秩序时,学者很少产生争论。克拉斯纳在1976年的一篇文章中使用了三个指标来衡量:贸易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关税以及地区内贸易的集中度。第一个指标数值越高表示自由程度越高,国际经济体系越开放;后两个则相反。吉尔平在1975年的书中还用了对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的流量。80年代的学者大多数使用关税指标进行历史案例的检验。

第二,理论基础的探讨。理论上对霸权稳定论进行挑战的主要有三点:首先,自由贸易是否是“国际公共物品”。约翰·科尼比尔(John Conybeare)认为公共物品理论是霸权稳定论的理论基础,从定义上讲,公共物品具有两个特征:非排他性和共享。而自

Michael C. Webb and Stephen D. Krasner,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p. 186.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p. 32 - 38.

David A. Lake, "Beneath the Commerce of Nations: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tructur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8, No. 2, 1984, pp. 143 - 170.

Bruce Russett, "The Mysterious Case of Vanishing Hegemony; Or, Mark Twain Really Dea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9, No 2, 1985, pp. 207 - 231.

Susan Strange, "The Persistent Myth of Lost Hegemon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1, No 4, 1987, pp. 551 - 573.

由贸易的收益是竞争性和排他性的,国家可以通过征收关税调节贸易的收益,因而并不是一种公共物品。霸权稳定论的结论适用于其他国际经济问题领域,但并不适用于贸易领域。金德尔伯格注意到了这一批评,认为在没有世界政府的国际范围内,如何生产公共物品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金德尔伯格看来,国际机制并非解决办法,同时并非每一个大国都通过垄断地位获取额外利润。在危机时刻迫切需要国际公共物品时,一个具有道德感召力的领导者是至关重要的。其次,国家偏好如何界定,霸权国是倾向于绝对获益做一个仁慈的霸权,还是追求相对获益扮演一个强制性的霸主。乔安妮·高娃(Joanne Gowa)的研究表明,由于贸易存在安全外部性,霸权国更倾向于和盟友而不是对手进行贸易,因此,一个自由国际经济秩序是有局限的。最后,到底是一个国家提供公共物品,还是可以由多个国家提供。金德尔伯格强调的是一个国家,吉尔平、克拉斯纳更多的是强调权力的霸权式分布。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通过对历史上三个时段——1890~1914年英国时代的金本位制、一战和二战之间的时期以及1944年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体系的研究,认为霸权稳定论更适用于解释比较短的时期货币关系的变化。如果要应用于较长时期内货币体系的变迁,那么从多于一个国家提供以及维持货币体系的稳定性来看,适合基欧汉概括的“霸权之后”。

第三,历史时段的类比。批评者的意见主要集中在19世纪是否只有英国一个霸权,霸权和自由国际经济秩序是否在时间顺序上相吻合?斯坦认为,霸权国的开放能力不仅取决于外部力量,也必须考虑内部力量。尽管自拿破仑战争后,英国已经成为霸权国,但是1815年英国的关税比18世纪还高,到了1840年,进口关税仍然占到政府收入的44.2%。因此,假如认可1860年才开始自由贸易时代,那么就英国而言,自由贸易要滞后于权力的霸权式分布。

第四,地区性的扩展验证。由于霸权稳定论的提倡者立足于国际体系层次,那么

John A. C. Conybeare, "Public Goods, Prisoners' Dilemmas and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8, No 1, 1984, pp. 5 - 22.

Charles P. Kindleberger,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without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6, No 1, 1986, pp. 1 - 13.

Joanne Gowa, "Rational Hegemons, Excludable Goods, and Small Groups: An Epitaph for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World Politics*, Vol 41, No 3, 1989, pp. 307 - 324.

Barry Eichengreen,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ies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in Richard N. Cooper, et al., *Can Nations Agree?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9, pp. 255 - 298.

Arthur A. Stein, "The Hegemon's Dilemma: Great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p. 361.

这一结论是否可以应用到地区层次呢?弗雷德·劳森(Fred Lawson)1983年认为,既然权力差距越大越容易造就一个自由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而欧洲和半边缘地区间的权力差距相对于欧洲地区内应该更大,那么半边缘地区的自由贸易应该更频繁。事实上,他通过对阿拉伯半岛三个港口贸易城市自1800年到1905年间商业关系的分析,发现该地区内国家间自由贸易关系的存在并不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大国存在,相反倒是地区间竞争关系加剧时贸易更活跃。劳森认为,整个19世纪英国对待这些边缘地区的商业政策是强调限制和控制当地经济活动,实质上是“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唐纳德·克龙(Donald Crone)1993年对亚太地区经济合作进程和美国霸权关系的研究表明,美国权力的介入尽管总体上促进了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进展,但是这种权力过于强大和过于弱小都会起到反作用。当权力差距过大时,霸权国无须借助于制度化来控制,直接实行双边或者单边行为就可以获取最大收益。20世纪80年代,随着日本和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差距与美国逐步缩小,美国转而支持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克龙强调,把大西洋地区工业化国家的经验推广到其他地区时要十分小心。

经过这些学者的努力,霸权稳定论较为全面地探讨了政治权力和国际经济秩序之间的关系,对于权力在什么范围、什么样的议题以及何种程度上起作用有了比第一代学者更为扎实的理解。上述四个方面的深化、拓展、检验也表明,尽管霸权国和自由国际经济关系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一定成立,但是从经验上看两者的吻合程度很高。爱德华·曼斯菲尔德(Edward Mansfield)在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则代表了一种折中,他认为就国际贸易而言,权力集中和自由贸易之间呈现出一种U关系:在权力集中过大或者过小时,国际贸易的体系是开放的。霸权式的权力分布只是连续谱系中的一个极端,同样,小集团合作领导是另一个极端。1998年,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第二代领军人物海伦·米尔纳在《外交政策》创刊50周年专辑中撰文呼吁,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要走出霸权稳定论强调国际经济体系和国家权力的分析框架,转向重新纳入国内政治探索国际国内相结合的分析范式。米尔纳做这篇总结和展望时,霸权稳定论已

Fred H. Lawson, "Hegemony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Reassessed: A View from Arabi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7, No 2, 1983, pp. 317 - 337.

Donald Crone, "Does Hegemony Matter?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Pacific Political Economy," *World Politics*, Vol 45, No 4, 1993, pp. 501 - 525.

Edward D. Mansfield, "The Concentration of Capabilitie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3, 1992, pp. 731 - 764; Edward D. Mansfield, "Concentration, Polarit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7, No 1, 1993, p. 124; Edward D. Mansfield, *Power, Trade and Wa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79.

Helen V. Milne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Beyond Hegemonic Stability," *Foreign Policy*, Vol 10, No 1, 1998, pp. 112 - 123.

经完成了从 80 年代前注重体系转移到对外经济政策的分析,而对外经济政策的分析为引入国内政治开辟了道路。从学术发展的角度谈米尔纳的总结,笔者认为有以下两点值得注意:其一,米尔纳不是在 80 年代末提出要超越霸权稳定论,在一个学科发展的初始阶段,一个核心的学术命题或者议题对推进共识、凝聚智力是至关重要的。霸权稳定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学诞生之初提出了明确、清晰的因果机制以及可以验证的具体问题领域,为推进学术探讨建立了参照系和对话平台。其二,学术的发展需要方法的支撑,方法是同具体问题领域的探索联系在一起,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是应用其他学科特别是经济学的方法以及分析工具的探索、融合的过程。

五 结论

霸权稳定论从 20 世纪 70 年代诞生初始就在学术界引起了反响,在 80 年代有力地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从 70 年代强调维护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需要一个霸权国这样一种政治逻辑出发,经由众多学者的论辩,霸权稳定论到 90 年代已经扩展成为由安全视角的霸权理论和公共物品视角的领导理论组成的一个研究纲领。80 年代的学者在争鸣霸权稳定论时,除了从核心概念、理论基础、历史类比和地区扩展等四个层面深化霸权稳定论的学理内涵之外,它从体系层次向霸权国的对外经济政策的分析这一转变为 90 年代以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重视国内政治做了接洽。

霸权稳定论的发展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而言至少有三点特别值得重视。第一,从研究对象看,区分问题领域是推动研究深入的一项重要学术训练。霸权稳定论从三个不同的问题领域推进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但是各不相同。对于直接投资而言,与贸易、货币问题最明显的不同之处是没有一个国际性的机构来规范各国的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标的合法性。三个问题领域除了经济学基础不同之外,它们和国内利益集团的关系也不同。从政策变化带给国内集团的成本收益来看,贸易政策的特性是收益集中而成本分散,这也是为什么总是容易引起关注、有利益集团不断游说政府改变政策的原因所在。而投资政策相对而言成本和收益都集中,因此国内集团的斗争最为针锋相对,政策的改变也相对困难得多。汇率政策的特性是成本与收益都分散,因此不仅不容易引起国内利益集团的关注,也不太容易进入大众视野,从而成为国家政策制定者最容易控制的政策。

第二,从学科的角度看,国际政治学家和国际经济学家的相互批评对于推进国际

曲博:《国际力量、国内政治与对外经济政策选择》,载《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1期,第77-83页。

政治经济学研究相当重要。金德尔伯格创作 1973 年作品的灵感来源显然有很长的历史,他本人曾积极地评阅国际政治学家的作品,例如拉尔夫·霍特里(Raph Hawtrey) 1952 年的《主权的经济学视野》、莫顿·卡普兰(Morton Kaplan) 1957 年的《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进程》等。在作为经济学家的金德尔伯格看来,政治学和经济学最大的差别在于,后者有相对简单并且稳定的衡量指标。吉尔平、克拉斯纳都曾经对政治学、经济学的著作做过出色的回应,他们自身的作品也越出单一的国际政治研究领域,进入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的视野。这一跨学科交流的特性是保证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前沿性的一个重要条件。

第三,从学者的角度看,研究者的持续能力与学者之间的学术分工也很重要。尽管霸权稳定论已经不再是继续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动力源,但是众多参与霸权稳定论辩论的学者接受并扩展了政治与经济相互联系的思想。霸权稳定论的深化离不开学者之间的学术分工与合作。正如基欧汉在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时总结的那样,推动学术研究进展的主要还不是一项理论,而是学术共同体。基欧汉本人就长于提出概念和命题,而拙于验证。单个人的能力与精力都是有限的,而学者之间的合作则能整合更多资源,尤其是经验与方法的配合更能推进研究。霸权稳定论的发展表明,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对话、富有理论修养的学者与娴熟运用计量方法的学者之间的配合有利于澄清争论。更为重要的是,以术业有专攻的姿态展开争论有利于建立共识。

[收稿日期:2009-09-13]

[修回日期:2009-12-06]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Charles P. Kindleberger, "A Monetary Economist on Power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6, No 4, 1954, pp. 507 - 514; Charles P. Kindleberger, "Scientific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11, No 1, 1958, pp. 83 - 88.

Robert O. Keohane, *Power and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 9.

【Key Words】causal effect, causal mechanism, process tracing, causal inference

【Author】Qu Bo, Lecturer,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and IPE Studies

Zhong Feiteng (109)

【Abstract】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the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HST) improves and strengthens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PE). Based on different issue areas, scholars argue that a hegemonic power was critical to a stable and ope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in the 1970s; in the 1980s, HST was evolved into a grand theory from two perspectives. First, scholars examined whether the decline of hegemony led to the increase of policy intervention, and turned to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analysis; second, literatures were developed in four aspects, namely, core concept, theoretical approach, historical comparison and regional level. Since early 1990s, consensus has been reached that there is a U - curv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wer concentration and open economic order.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HST shows enlightenments on IPE studies in three ways: issue areas, multidisciplinary learning and scholarship cooperation.

【Key Words】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intellectual history

【Author】Zhong Feiteng, Researcher, Institute of Asian Pacific Studies, CASS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Exit Cost and Conflict Escalation: A Theoretical Analysis Based on Dynamic Game Model

Kuang Yanxiang (123)

【Abstract】How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influence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has long been a debate. Based on Crescenzi's exit model, this article constructs a five - stage game model and tries to explore how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influences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of different levels from a dynamic perspective, trying to find out how economic